

清·吴汝纶撰

吴汝纶全集 一

施培毅 徐寿凯 校点



安徽古籍丛书

清·吴汝纶撰

吴汝纶全集 一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汝纶全集/(清)吴汝纶撰;施培毅 徐寿凯校点. —合肥:
黄山书社,2002.9

(安徽古籍丛书第9辑/《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纂)

ISBN7-80630-792-3

I. 吴… II. ①施…②徐… III. 吴汝纶-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597 号

本书出版得到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资助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书 名 吴汝纶全集

校 点 者 施培毅 徐寿凯

审 订 者 贾文昭 赵应铎 刘秉铮 诸伟奇

责任编辑 徐成志 班 古 杨晓红

责任校对 王刚琪 金 旻 张红一 张曦仲

封面设计 国 亮 弘 伟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875

字 数 1,998,000

印 数 0001-2000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30-792-3/Z·128

定 价 196.00 元(全 4 册)

凡发现本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数字资源
PDG



吴汝纶先生像

錢財可赴人急者頗自恨向來取友之不精矣詢未便知
正月未必出門倘能

枉駕過我一傾懷抱不邪

來示獎帑所敢承至

以節儉相規則弊愛慈拳敬豈佩乃事經書之衣
帶巾本無仕宦之材徒以二親顛白甘饌不供生令出
勒移書冊塵經真乃山谷兩稀食貧自足及為業此師友期
望過厚大懼貶越貽羞愧負知己念此令人惴惴不安若累
日閣下清貧似我而謀食更艱苟可稍資子言自應

作者手札

易說第一冊

周易之名說者以交易不易變易釋之皆未審也戴記
祭義篇云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
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易者占卜之名因以名其官
周禮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易與兆夢同類其不
以交易變易爲義決也鄭君周禮注云易者揲著變易
之數可占者也蓋亦釋易爲占史記大宛傳云天子發
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武帝輪臺詔云易之卦得大
過發書易者猶云發書卜也易之者卜之也易爲占卜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问 丁继哲 刘永年 李广涛 杜维佑 陈基余 郑锐 郑淮舟 张立一 胡云龙

侯永 秦德文 陶有法 崔剑晓 潘锬璋

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王坦 龚存玲

委员 刘学锜 汪石满 余焰炉 陈贤忠 周心田 徐东平 诸伟奇 黄书元 黄德宽

黎洪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理事长 余焰炉

副理事长 方俊文 季昌清

常务理事 丁光涛 卞兆龙 仇貽壬 朱邦福 朱维芳 汤才欣 陈桂生 张世云 张振明

郑英保 郭化兰 赵敏生 钱进 董学仁 穆建科

安徽省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 安平秋 任继愈 许逸民 吴小如 周一良 周绍良 祖保泉 胡道静 贾文昭

舒芜 傅璇琮

主任委员 刘学锜

副主任委员 严云绶 黄德宽 韩酉山

委员 孙文光 任弘毅 纪健生 沙宗复 余国庆 胡金望 夏秀流 诸伟奇 陶新民

蒋国保 鲍善淳

按姓氏笔画排列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菁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粤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先哲遗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之编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纂安徽古籍丛书。编纂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最其体例，约有数端：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时间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为限，根据内容，分类成辑。注意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和注释、今译。校勘，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订

前言

一

吴汝纶，字挚甫，又字至父，是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教育家，生前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的盛名。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青少年读书时期：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出生于安徽桐城高甸刘庄（今属枞阳县）一个耕读之家。父亲吴元甲，字育泉，咸丰元年（一八五二）以诸生征举孝廉方正，但生性恬淡，不乐为官。曾国藩慕名曾有意聘请为家塾教师。吴汝纶自幼从父读书，没有其他授业老师。

二、应考入仕时期：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吴汝纶二十四岁时才出应县试，取第一，接着又取府试第二、院试第一；同治三年取乡试第九名；同治四年参加会试，取进士第八名，『遂以内阁中书用』。同年，被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曾国藩罗致为幕府。同治六年，因曾保举以『襄助军务出力』加『内阁侍读衔』。同治九年，又因曾荐举，『以直隶州牧用』，于次年就任直隶州深州知州。同治十二年二月，因父亲病故，按例去官居丧。同治十三年五月，入江苏巡抚张树声幕。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七月，又因母



便览、西医内科全书、西药大成、佐治刍言（以上被推荐作大、中学校教材）。从吴氏的尺牘和日记可知，这并不是全部。

随着『广览』，吴汝纶对『西学』的认识不断深入。光绪二十三年，他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已经认识到赫胥黎的理论将对国人产生重大启蒙作用，在给严复的回信中指出：『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并且表达了得阅此书『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的狂喜心情。在序中则称赞『赫氏之道』，『斯以信美矣』！现在，『西学』对他不再是『无所谓道也，器数名物而已』了，『西学』不仅有『道』，而且其道『信美』。伴随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吴汝纶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一段经历：从批判科举制度到为我国近代学校体制设计蓝图。

光绪二十年，吴汝纶笔下首次出现『目前西学未兴，人才不出』的言论。光绪二十二年，又有西学『至深邃微窈』、『盖皆本富之至计』等文字。二十三年，也就是为天演论作序这一年，他在送季方伯序一文中写道：

凡内治云者……必振民之穷而使之富焉，必开民之愚而使之智焉。今之内治者，无所谓富民之道也，能不害其生斯贤矣；无所谓智民之道也，能成就之使取科弟于有司斯才矣。民固穷也，吏虽不之害，其穷犹若也；民固愚也，虽成就之使掇科弟，其愚犹若也。又况不能成就之反害之者天下比比也。循是不变，穷益穷，愚益愚。今外国之强大者，专以富智为事。吾日率吾穷且愚之民以与富智者角，其势之不敌，不烦言而决矣。而所以富智民者，其道必资乎外国之新学。

次年三月又激愤言之：『他国人人有学，唯恐民愚，务谗其智。中国不唯民愚也，乃至满一国尽愚士、愚卿大夫！』（尺牋答方伦叔）议论的锋芒，直指以科举制度为中心、以传授周孔经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教育，认为它是一种贫民、愚民教育，只能培养出愚民、愚士、愚卿大夫，要想改变为富民、智民的教育，必须『取资外国新学』。这些议论，特别指中国旧学是『愚民教育』之说，在当时实为惊世骇俗之论，但也是击中要害之论。这是他公开抨击科举制度的开始。

此后不久，戊戌变法，吴氏的文字中明确出现『直应废去科举』的主张。五月十五日给李鸿章之子李季高的信中针对光绪皇帝的变法诏书写道：『端午诏书』竟废去时文不用，可谓大快。某窃有过虑，以为舍时文而用策论，策论之不足得人，仍恐不如时文，以其茫无畔岸，人竞抄袭，而考官时文出身，不能辨策论高下。宋世本号策论为时文，策论敝极，乃改用经义。今复策论不过一、二年，其敝已不可究诘矣……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

这段议论批评了康有为的『科举不能骤废』、考试改八股为策论等主张，并意图通过李季高促使李鸿章上奏进言：径废科举。可是李鸿章不愿冒这个政治风险，他和张之洞等人一样，主张『科举与学校并存』。吴汝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坚持废科举、兴西学的主张，『吾谓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尺牋答方叙伦）；『愚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选士』，『学堂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殄瘁之忧』（尺牋与萧敬甫）；国家取士用人『莫如废科举而专取之学校』，『至欲学校成材，则科举宜废』，因为科举易

而学校难：『今入场数日，携数寸之管，书教番之卷，便可钓取举人、进士，又为时论所荣，彼何为埋头束身，腐心耗神，费十数年、数十年之日力，以博学堂无足轻重之寸进哉！』（答陆伯奎）他又尖锐地批评张之洞等人『科举与学校并行不悖』的谬论：『科举之法，经去年之乱，乡里秀孝，皆知时文之当废，此时专设学堂教士，乃所谓因势利导，改革至易……张公知唐专考词章为下策，乃独取下策为法，此何为也！事有当旷神怡大变与天下更始者，学堂是也。今与科举并行，科举易，学堂难，谁肯舍易从难？此安能并行不悖哉！』（日记时政卷）试把吴汝纶的论点贯串于下：径废科举，大兴西学；科举不废，学校难兴；学校不兴，人才不出；人才不出，国家将亡。这个逻辑性的论断，颠扑不移。

对此，笔者不想展开议论，只想指出两点：一、吴汝纶的意见都是切中时弊的。清廷推行『学校与科举并行』不到两年，就发现除南方沿海各省外，省县举办学校大多虚应故事，等于空话一句，有的不过把书院的招牌换成学校的名称，教学仍然搞他的科举业。一贯坚持『科举与学校并行』的张之洞、袁世凯只能认输，几乎照抄吴汝纶的论断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及第之人，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相率观望，私立绝少』，请旨『立罢科举』。光绪三十一年，科举终于废除。二、当时朝野主张变法的知名人士中没有任何人像吴汝纶这样始终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就连一些被现代学者誉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士，也无人发表过这样的议论。比吴汝纶晚生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并存论』者。比吴汝纶早生的郭嵩焘、王韬、容闳及年纪与吴氏相近的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或出任过驻外使节，或曾到欧美游历，或本人就是西方著名大学的留学生，他们也都未有『径废科举』的文字。不错，他们之中有几个

人主张清廷进行政治改良，搞英国式的议会制，但是这在举国都是愚民愚士愚卿大夫的情况下根本行不通，不过是书生议论。吴汝纶的『变法』主张很多，大多从实际出发，既有先导性，又有可行性，从这一角度加以衡量，吴氏力主废除科举的历史贡献，完全可以和那些『改良派』的激进言论比美。

正由于上述一系列突出表现，吴汝纶得到了『学贯中西』的评价。吴汝纶『周咨』的外国人士中，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而驰名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路崇德等人，与吴汝纶论交以后，赞之为『东方第一人』。日本人早川新次对吴汝纶十分崇拜，说他是『方今东方儒林中最有开化之思想者』。从吴汝纶发病到去世，早川一直守在他身边，事后还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在安庆寄邦人书（见本书附录），日报发表后，许多知名人士著文悼念。光緒二十八年，清廷议复庚子被毁的京师大学堂并在全国兴办中、小学堂时，吴汝纶成为众望所归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人选。

有人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个职位，比拟为现代大学的教务长，这不太确切。当时清廷虽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学部大臣，但是并无『学部』这个机构，初议使张兼大学堂校长，便有依托大学堂以管理全国兴办学校工作之意（清史稿学校志）。所以大学堂总教习一职，不只是管理大学堂的教务而已，还要协助学部大臣过问全国兴办学校的工作。吴汝纶陈述坚辞不就的理由有十条（尺牘与曾履初兄弟），还有不便明说的两条原因，一是当时清廷虽然决定兴办学堂，但仍拒绝废除科举，搞『并行』制，吴汝纶当面向张百熙提出『科举不废，学校不兴』，张以『今时虽孔孟复生亦不能废科举』答之，表现很不虚心，而且有任用私人的倾向。不久清廷又增派荣禄为学部大臣，此人不学无术，权力仍在张百熙之上。吴

因此担心，在他们钳掣下自己无能施展，学校很难大兴。二是吴氏从光绪二十三年就开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日记教育卷），得出结论：『学制不划一，欲立学育才，此必不可侥幸于万一之事也。』（尺牘与陆学使）但学制究竟应该如何划一，吴氏当时胸中并无蓝图。为此他想到日本亲自访问明治维新后兴办西学的经历及其现行学制，作为我国发展近代教育的借鉴。他既坚辞总教习而不得，便与张百熙约定一年为期暂不言辞，在此期间自己到日本访问学制，供朝廷制定新学制参考。于是吴氏便有了日本之行。

吴汝纶于光绪壬寅五月初东渡，在日本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调查访问活动，眼界大开，自称『胜阅报纸、译书者百倍』。他虽已年过花甲，但奋不顾身，全力投入，先后参观访问大中小学、师范、女校、幼稚园、军校、残疾人学校、各种专科学校、实业学校四十余所，在文部（教育部）听取介绍十七次，访问教育名家一百多人。同时参观访问了造船、货币、印刷、银行、医院、邮电、法院、警察、监狱、交通等部门；还进行了多次学术交流和应酬活动；整理调查访问材料成书东游丛录一部，十余万字；发出书信、演讲约七十回，撰文八篇、诗七十余首，总计约二十余万字。丛录于归国前夕脱稿付印，五日成书，带回国内呈管学大臣『以备采择』。此外，访问期间先后七次给张百熙写信，报告访问所得，提出兴学建议；又给张百熙幕僚及友人发信十余通，纵谈访问印象与心得。在这些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中，吴氏为我国近代学制设计的蓝图和一些重要设想大致可见。

第一 关于中、小学体制

他设想：小学六年，前四年浅，后二年略深；中学省略日本的『高等学』，以为日本中学体制虽然采自欧美『公学』，但学年过长，学科过多，未可言善，不能照搬到中国，我国的普通中学应定为三学年，如此则『学徒六岁入学，至十六岁，似普通之学已足用也』。可以直接考入大学，不必再经『高等学』。中学应学英语。可以另设外语专门学校教其他国家文字。中学『非大减功课不可……于西学则宜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中（国）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每人每日止能学五、六时，至多止能学五、六科』。

第二 提倡『省笔字』和国民教育

访日前夕，他还反对以『俚言俗说』（白话）教学，访日期间，发现日本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普及国民（义务）教育，重要前提是统一全国语言，推行『五十音图』（假名），使『言文一致』。他修正了反对白话的观点，写信向张百熙正式建议推广『省笔字』（拼音字母），统一『京城声口』，小学设『国语』课。查史料，他可能是第一位正式向最高教育当局建议推广拼音字母、普通话的教育家。他预料未必即被采纳，但预言终究会被推行。

第三 关于大学校和专科学校

他建议大学分为理、工、文、农、法五科，强调医学重要，宜另设医学堂。专科学校『政治、法律之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大学师资的『救急办法』可延请『西师』，也可请日本教师，费用少而收效一样。要首先开办师范速成学校，这些学校应以『西学』为主，尽快

培养出本国教师。大学初办，还没有可以循序而进的中学毕业生来源，可以仿用日本『贡进士』的办法，选拔现有的高材生徒入大学堂，主要教授『西学』，数年后便可得用。

第四 关于德、智、体育

吴汝纶曾说过『智开然后知德教』，认为智育占主导地位。但他也很重视德育，曾多次和日本教育家讨论德育问题。各家说法不一，有的说德育就是传授儒学的仁义忠信，有人主张大兴佛教；有的则认为，『今日之伦理，非打东西之粹而为一治不可』；有的强调爱国教育。对这些意见，吴汝纶都客观地记录下来，未作评论。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一贯的言论推知，『打中西为一治』，早已是他理想的追求。他给张百熙的第一封信反对京师大学堂内修建孔庙，认为『崇饰孔庙，于学无益』，显然不会赞成将儒学宗教化。爱国教育，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收到实效。至于体育，他十分关注，建议学校设体操课，注重学校卫生。

第五 主张新学、旧学并存

他承认中国旧学有许多缺点，但坚持『旧学不可废』。他认为『六经传记所遗留之伦理学，实立国不刊之典』；『周孔遗泽历久长新……此亦我国独立千载之原因』；『周孔之教，独以文胜，周孔去我远矣，吾能学其道，则固即其所留之文而得之』，周孔的精神『永存于简册间，不可得废毁』。但他一直苦恼的是教学时间有限，『本国学加入普通学便是难事』，『新旧二学，恐难两存』。他除了提出设古文（后来改叫国文）课外，似乎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据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吴汝纶对我国近代教育贡献突出，影响深远。直到现代，中小小学体制和大学分科，仍有吴汝纶设计的印迹；汉语拼音、设国语课、国民教育等，正如他的预料，都已逐步实现；如何『打中西为一冶』不仅是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旧学不可废』的意见，如果从保存和继承炎黄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它也是对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作为近代教育先驱的吴汝纶，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

吴汝纶称『师』者共有五人，其中『薛师』、『周师』、『宝师』，都是他科举名分上的『师』，而曾国藩、李鸿章则不仅有江南乡试时的『座师』和『监考官』师生名分，也是他由衷钦服、受益很多的真正良师。尤其是曾国藩，对吴汝纶的古文创作和中学修养都有很深的影晌。

吴汝纶虽然被世人目为桐城文派末代宗师，但吴汝纶对方姚『义法』和将『义理』『文章』混为一事以及他们的文章，都不完全信服。他青年时就有与方姚文论不同的观点，认为『文章者以气为主』（文集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进入中年，又有褒扬曾国藩、张裕钊而贬抑方苞、姚鼐的议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